

比较政治学 理论与方法

潘维 著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 Methodolog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潘维 著

比较政治学 理论与方法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 Methodolog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潘维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1-23882-0

I. ①比… II. ①潘… III. ①比较政治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0582号

书 名: 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著作责任者: 潘 维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882-0/D·35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176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政治常识”，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授“比较政治学”的教案，亦是为写作中的《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一书准备的“理论篇”。

通过划分物质、精神、制度三种文明，结合农牧、制造、服务三种生产方式，本书解释自“产业”诞生，到三大古文明，到中古，到近现代，到后现代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制度文明。以当代政治的争议话题为材料，以定义简洁的基础概念为关节，作者构筑了以“文明”为骨架的长链条因果关系，为“中国视角”或“中国学派”的政治知识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理论框架。

作者还试图避开“现代”学术形式，在文风和著述体例上回归传统，追求“后现代”的直接、朴实、散漫。

目 录

第一章 比较方法

第一节 视角

第二节 学科

第三节 纲要

第二章 政治原理

第一节 政府

第二节 国家

第三节 领袖

第三章 文明类别

第一节 分类

第二节 演化

第三节 结果

1

3

7

21

27

29

40

48

57

59

66

82

第四章 制度文明	97
第一节 社会	99
第二节 政治	120
第三节 评价	139
第五章 经济政策	153
第一节 市场	155
第二节 干预	165
第三节 比较	175
第六章 融合时代	185
第一节 交流	187
第二节 趋同	200
第三节 存异	224
附表 地区、国家、面积、人口	238

第一章

比较方法

第一节 视 角

理论回答“为什么”而非“是什么”。

理论由重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对这关系的简要解释构成。理论是简约的,简单是美。大道至简至易。

理论都是主观的。表述因果变量的概念都由人脑创造和定义,随学人认知的变化而进化,根据实用目的而更改,都是主观的。

科学理论以“可证伪”为基本标准,不是“真理”。与宗教不同,科学拒绝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有用性”而非“正确性”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科学知识主要由理论构成。科学理论因其“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而“有用”。理论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最重要的工具。

学人们并非凭空建构理论。理论建构来自学人们对重要“存在”的认知。不同的理论对“存在”的解释力不同。解释力较强的因果关系“有用性”较强。

在我国当代语言里,“理论”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政府的“大政方针”。此种“约定俗成”不属本书的讨论范围。科学理论的核心是因果关系,非因果的表述不属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重要的,但并非所有重要的都是科学理论。

相对于人类不断进化的理论知识而言,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

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和人类社会。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构成社科理论的概念受不同语言和语言艺术的影响,更受研究者身处的不同环境影响。因此,探索不变的自然规律有预见性,探索“社会规律”则主要不是为了预见。

自然规律没有“未来”。从逻辑上讲,如果社会科学可以精确预测人类的“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因果知识,解释已经存在的事情。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同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调整行为,塑造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

理论都是主观建构的。这个判断对社会科学极为重要。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存在,取决于观察的不同视角,取决于不同语言中的概念差异。

本书企图从“中国视角”补充和重构流行于今的政治知识。其中阐述的理论来自对“存在”的认知,来自中国视角的、对世界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笔者尚未完成的《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将接续本书,诠释当今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检验并改善本书理论的“有用性”。

纯粹追求“视角”的“中国特性”无异于追求狭隘。汲取世上已有的学问成就是所有学人的渴求。

不少学人希望从“世界视角”中立地看人类政治,甚至跳出地球,从月亮上客观地看。但这是做不到的。学人难逃狭隘,因为脚踩地球上有限的土地,自身均有所属的地区、国家、历史,在这些环境下成长、生活,并用母语写作,以母语人群为主要读者。

迄今为止,主流的政治概念及其因果体系大多是西方学人从自身视角和经验做出的。这些学人鲜有中国经验,不熟悉象形文字,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视角。他们发明的政治概念和逻辑体系被大量翻译成中文、不断转述,遂成主流。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因对西学的硬译及对西方的仰视,也使中国视角和本土概念在中文世界里被忽略甚至歧视。

地方视角有益于政治知识的积累。笔者曾在意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岛上体味当地居民看欧洲甚至北意大利的视角。西西里岛地处当今西欧的边缘,相当落后,却是欧洲文明初兴时期的核心。站在西西里岛上看欧洲,与站在德国或法国的立场看欧洲非常不同,也很有趣。

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使笔者意识到:中国视角和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弥足珍贵。其珍贵性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不久前还曾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还因为中国长期在地理、历史、语言上封闭。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视角,中国视角好似从月亮上看地球。比如,西方的政治研究从古至今强调形而上的“制度”,并用参与治理者的人数来区分“制度”。而中国的政治研究自古至今强调治国之“道”,关心内容而非形式。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视角能在语言、概念、道理上补充已有的政治因果知识。

从中国视角出发,此书还批评当今政治学流行的“制度迷信”,特别是对“多数决”制度的迷信。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非来自虚无。

什么是制度迷信?视某种政治制度为人类所有重大政治结果

唯一重要的原因,拒绝探究制度的社会起源和存在条件,用关于制度的价值偏好取代因果关系的探索,就是制度迷信。

制度迷信导致政治科学里的“反智”倾向。尽管“顶层设计”之类政治“工程”在冷战后不断制造大规模的血腥冲突,制度迷信却长盛不衰。

世上没有不变的种族,没有不变的文化,也没有不变的制度。制度歧视与种族和文化歧视没什么区别。今日之种族和文化歧视主要体现为制度歧视,今日之帝国主义集中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制度帝国主义。因此,尊重他国首先体现为尊重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

一切存在皆有原因。政治制度来自社会,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

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不是“永动机”,不能永葆国家青春,不能让任何政府或事物逃出兴衰循环的命运,逃出中国哲理所说的“势”或“大势”。

第二节 学 科

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就发生“政治”。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书属比较政治学类。比较政治学就是政治学。

政治学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比较政治学用“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方法,“科学”地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

为说明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笔者先讨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异同,然后简述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

人文学科(humanities)以描述和思辨为主要手段,以回答“是什么”来表达“应然”,弘扬某种价值观。人文学科看重主观世界。历史学、哲学、法学、文学等属于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以跨时空的“比较”为主要手段,通过实证具体的因果关系来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看重客观世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属于社会科学。

从定义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是可以抽象区别的。我们自幼学“科学”,读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而非“十万个是什么”。

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研究人类社会,在我国统称“文科”。较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距离,社科与人文的关系亲近得多。在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人文学科的多个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院领导经常使用“人文科学”一词。若承认人文与社科的区别,名称就会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我国官方把全国的文科统称“哲学与社会科学”。把哲学视为一切学科的最高,把文学也纳入社会科学,大约是全球唯一。

在而今已经崩溃的前苏联,“哲学”是探索“绝对真理”的学问,“科学”意味着“正确”,而“社会科学”讨论不能被人的意志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确实有模糊之处。一方面,虽然以研究者的价值观来干扰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没有“正当”性,却没有哪个社科学人在著述中能完全逃脱自己价值判断的影响。而且,缺少了历史学提供的资料,社会科学很难生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对理解客观世界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文研究者从事“比较研究”,追求“价值中立”地探索和实证因果关系。于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中涌现出了许多社科性质的著名子学科,如“比较法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等。

社会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强劲崛起塑造了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灌输有关“正义”价值观的“政治哲学”和“宪法学”曾几乎囊括了西式政治学的全部。这门学科大体属于“法哲学”范畴,主要强调西式宪法和机构安排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在方法上则主要是思辨而非实证的,通过概念演绎得出价值判断。所以,此时期的政治研究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然地理区隔迅速消解,民智大开,学者们接触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机会骤然变得丰富,眼界也较前大为宽阔。

学人们发现,在一国被视为当然的价值观在另一国可能不被视为当然。一个美国人在某非洲国家向摊贩购买手工艺品,对方索价 10 美元。美国人提议买 10 个,每个 8 美元。非洲摊贩的回答让美国人颇为吃惊:若买 10 个,每个须付 12 美元,因为制作 1 个是快乐,制作 10 个是痛苦,买方须为这痛苦付钱。学人们发现,苏联社会对“正义”的理解与美国社会的理解明显不同,而且也有理性思辨辩护。同时,只有比较衰败的中国与崛起的西方,才能理解中国知识界的百年“救亡”情结,理解绝望悲壮的《国歌》歌词至今还能引发共鸣,理解中国大众超越各种价值观的“国强民富”追求。

学人们还发现,同样一组价值观在不同国家里的重要性排序也不同。美国以强调“自由”为傲,欧洲以强调“平等”和“法律与秩序”为荣。“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之间有“张力”。在美国,擅长修辞和诡辩的律师非常昂贵,他们对司法结果的影响与法律规定至少旗鼓相当。而在多数欧洲国家,让金钱“自由”到“无法无天”程度的现象会被鄙视。

人文学者表达对某种“应然”和应然“排序”的偏好;而社科学者“价值中立”地“实证”不同的“应然”和各种对本国文化而言“奇怪”现象存在的原因。

比较和理解不同地区为什么存在不同的应然和“例外”非常有用。对美国,这种知识意味着应付和管理陌生的世界,意味着“马歇尔计划”,意味着打赢冷战。于是,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积极资助大学广设“比较政治”学科。

进行比较研究,才会设问“为什么”。以“为什么”设问,答案必是因果之解。自此,政治学里缺少时空条件比较的纯粹思辨和价值判断逐渐式微。追求对“奇怪”行为的解释成为政治学科的风气。追求对行为的解释就是追求“科学性”,就是淡化关于“是什么”的描述。

缺少比较和归纳的纯思辨不会催生新知识。即便对思辨的爱好者而言,催生新知识也依靠比较。逻辑演绎依赖概念定义的精准,但同样的概念在不同语言中内涵可能不同。概念的内涵不同会导致逻辑体系不同,貌似相同的知识体系在不同语言里就发生变异。尽管“democracy”被翻译成“民主”,但词义却有代民做主、代议制、多数决选举、变相贵族制、现代寡头制、人民做主、人民公决、抽签决定等多种含义。这在非字母文字的中文里最明显。中文的“法”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与英文的“law”有相当不同的历史文化含义。

使用价值中立的“行为”一词、比较行为存在的时空条件,创造了政治学的“科学”导向。“行为研究”让政治学脱离了法哲学,崛起为显学。在美国,这股新风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原先人文导向的大学“政府系”多改名为“政治科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在“政府系”或“政治系”时代,政治与法律不分,80%以上的教师讲授政治哲学和宪法,弘扬关于政体“好坏”的价值观,并授予毕业生法学学位。在“政治科学系”时代,80%以上的教师讲授不同地理区域的比较政治,通过实证解释“为什么”,并授予毕业生政治学学位。

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必须被“重复实验”所验证。在社会

科学中,因果关系主要在“行为比较”的实证里确立。

“结构”是美国政治学家普遍使用的一种理论工具。这个工具起初来自对生物学有机体的认识,即部分受制于整体,每个部分在整体中发挥一定功能。若把相关的事物当做单元,组成一个系统,并分辨这个系统的结构特征,就能理解组成系统的单元的行为。最初使用这种工具的是英国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他在19世纪中叶发明的理论以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来区分国家的“高级”或“低级”,认为各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人沃尔兹(Kenneth Waltz, 1924—2013)在20世纪后期使用这个工具来研究国际关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视国际关系为一个系统,其组成单元是“理性”的主权国家,其结构是无序的即“无政府”的,结构特征可以通过“超级大国”的数量判断,即“一个、两个、多个”,如同微观经济学通过大企业的数量来区分产品市场的三种结构特征,即垄断、寡头、自由竞争。这个理论解释为什么国家只要实力相似在国际行为上就相似,尽管其意识形态和国体不同。比较政治学里普遍讲授“依附论”,讨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各国的生存状况,也是对系统/结构/功能理论的应用。

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系统论的认识方法不是通过细分更小的个体,从个体的特性来认识整体。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到近代的马克思(1818—1883),阶级乃至阶层和利益集团分析,是理解政治整体的主要方法。

在认识组成系统的单元方面,“理性选择”理论获得了声誉,甚至以此推断“集体行动的逻辑”,从而贬低了系统的意义。承继经